

辛亥革命
与
20世纪的中国

中国史学会 编

1-17-53

266

3

辛亥革命

与 20 世纪的中国 (下)

中国史学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史学会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73-1169-4

I. 辛… II. 中… III. 辛亥革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424 号

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中、下)

编 者/中国史学会

特约编辑/陈 铮

责任编辑/孙 翊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 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76.5 印张 3 插页 172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套

ISBN 7-5073-1169-4/C·123 定价:16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与文化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 张岂之 方光华 (1513)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 胡绳武 (1537)

“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冯天瑜 (1560)

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 ... 狭间直树 (1583)

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龚书铎 宋小庆 (1599)

辛亥革命前后的欧化思潮 赵立彬 (1625)

民意与天意

——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张 鸣 (1644)

街头政治

——辛亥革命前后的下层民众、改良

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 王 笛 (1665)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林家有 (1691)

学部与辛亥革命 关晓红 (1717)

辛亥革命与广东女学 李兰萍 (1742)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与塑造“国民” 高田幸男 (1764)

辛亥革命时期的近代科学传播 史革新 (1786)

目 录

科学与民生

——关于孙中山科学思想中的人文价值

..... 刘仁坤 刘兴华 (1810)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

——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桑 兵 (1830)

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 刘贵福 (1860)

世界史和民族史的交汇

——康有为早期史学思想 李朝津 (1881)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宝成关 颜德如 (1898)

辛亥革命涉外问题与国际社会

孙中山与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始 张建华 (1917)

清末民初中国人对“黄祸”论的反应 罗福惠 (1938)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 杨天石 (1960)

辛亥革命与海关 冈本隆司 (1981)

中国报道——美国媒体与 1911 年辛亥革命 麦金农 (2000)

辛亥革命与俄罗斯舆论 阿·格·拉林 (2007)

武昌起义后中韩纽带的开始

——韩国独立志士申圭植与革命派人士的交往

及同济社、新亚同济社的成立 裴京汉 (2026)

从祖国到南洋

——清季黄乃裳革命思想之源起 (1899—1904)

..... 李金强 (2048)

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筹款情况研究

——以《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

目 录

《征信录》为中心	邹佩丛 (2075)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黄自进 (2099)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民间外交	赵 军 (2117)
日本海军退役军人对第三次革命的参与	
——一场不了了之的起义	小野信尔 (2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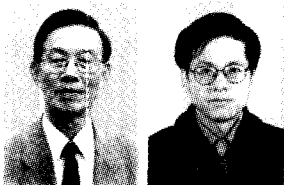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学术史研究

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张海鹏 (2165)
孙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毛泽东半个世纪	
论说述要	鲁振祥 (2182)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严昌洪 (2202)
近20年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	
综述	陈 铮 (2226)
台湾地区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1950—2000)	
.....	张玉法 (2259)
中国国民党对辛亥革命史料的征集与运用	刘维开 (2279)
故宫清档所见的辛亥革命	陈三井 (2304)
认识港澳史与辛亥革命研究一些新方向刍议	霍启昌 (2320)
《中华民国革命秘笈》之研究	久保田文次 (2369)
中山大学教授陈锡祺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	(2388)
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闭幕式上的发言	
厦门大学教授 陈诗启	(2389)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蒋永敬	(2391)

目 录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普莱斯	(2395)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陈三井	(2397)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拉 林 ...	(2399)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 中村哲夫	(2402)
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 山田辰雄	(2404)
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裴京汉	(2406)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石川禎浩	(2408)
广州电视大学副教授 关晓红	(2409)
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李文海 (2411)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 人文精神的发扬

张岂之 方光华

辛亥革命从酝酿到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前后历经十余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科学观念与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极其深厚的人文意识，既有对传统人文思想的批评，又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既有对西方人文思想的吸收，也有对西方人文思想的扬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自身特点，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政治理论的启蒙意识

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儒家关于人性的基本信念。儒家相信人类有仁、义、礼、智的情感基础和理性基础，有组成社会、形成礼仪制度的能力，并能通过政治改良，实现“小康”的社会理想，从而达到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理性能力的目的。这一思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封建宗法关系融为一体，其中既有古代民本主义的因素，也有专制主义的要素；儒家的政治理念是一个矛盾

的复合体。

在中国古代，对儒家为代表的政治理论的批评主要来自于道家和佛教。道家认为人性主要是自然情性，主张自然主义的政治秩序；佛教否定现实伦理政治关系的作用，认为社会改变的关键是要从人自身的解脱入手，否认人伦和社会制度的作用，追求虚幻的极乐世界。无论道家和佛教，都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础，没有产生富有理论思维意义的新的政治学术。

明末清初，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他们结合明清易鼎的客观现实，对于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制约方法、政治运行规则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以相权制约君权、加强地方权力制约中央集权、加强学校舆论对政治的监督作用等一系列主张，但都没有达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水平。这些观点在鸦片战争之后不断丰富和发展，到戊戌维新时期，成为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重要政治理论依据。

真正突破传统政治理论格局的时期是戊戌以后的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理论的探讨深入到政治的起源、政治建构、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区别了儒家的民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继承前者，摒弃后者，形成了新的具有价值理性内涵的政治理论。

辛亥时期，政治理论的变革源于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重新认识。但它与西方不同，不是以个人自由为前提，而是将人的价值与政治理性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几乎都把人当作一种自然存在，认为国家的基础是自然人性。当时的人们广泛引用霍布斯、卢梭、边沁、伯伦知理的政治理论，指出政治起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人生而平等，每个人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都不是奴隶。1903 年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认为：

人之生也，各有自由之权，为彼一身之主宰。执其自由之权，出而制驭世界上之事物物，使必与己意相适，不得少为他人所屈服，斯固理之所是者也。¹

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当时的思想家们广泛探讨了人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将理论的矛头对准宗教，也没有像西方那样渲染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是将这种探讨与对政治理性的追索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自由是政治的本质和目的。为了求得人的自由的充分实现，人们让出一部分自由，以契约的形式组成社会、形成国家。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是保护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剥夺这种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实现民族压迫的政策，使人民得不到自由，那么，这个国家必须改变国体，舍此前提，人民无自由可言。

立足于天赋人权，当时的思想家们广泛探讨政治的组织形式。认为理想的政治体制必须遵循两大主要原则：第一是主权在民。虽然人生而平等，但社会仍有分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组织，不能没有主权。人民让出一部分权力，达成契约，组织政府，君主形式上是国家主权的代表，但实际上人民才是主权的核心。刘师培曾经用马车来作比喻，说明君主、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国家就像一驾马车，君主是车夫，人民则是乘车者，马车向何方行驶应根据乘车者的意愿。所谓主权在民，具体而言是选举权在民，立法权在民，甚至革命权在民。第二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后来孙中山将此发展为五权分立。

当时的思想家并不局限于理论讨论，而是针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政治现状，具体分析如何实现这种理想政治的步骤。他

们积极投身于中国政治现实的改造。梁启超认为虽然民主政体是值得赞美的政体，但民权理想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他主张首先用君主立宪来完成专制政治到民主制度的过渡。而孙中山等革命派则对中国政治的现状作出了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估计。他们指出：说中国人不可行民主，是对中国国民的侮辱。中国人的能力并不逊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如陈天华就认为民主共和制度合于中国国情，中国民众的政治素质基本具备，可以享受国民的权利，尽国民之义务。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实行民主政治，并指出了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²

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是辛亥革命的政治目标。1905 年同盟会提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按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所说，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³这个方案，表达了孙中山等革命派要求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君主专制的决心，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的愿望。正如他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时指出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⁴值得着重提出的是，孙中山再三强调说明，革命党人不可以有帝王思想，应当为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而奋斗。⁵

在 20 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现实是满州贵族沿袭专制政治体制，对内进行民族压迫，对外妥协投降。要建立民主共和政体，首先就必须反抗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推翻专制政体。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形成了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民族主义”思想。其基本内容是：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力求免遭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或“共管”，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章太炎例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满汉民族不平等，汉人享受不到民主。他认为，排满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革命虽然以“排满”相号召，但目的是要推翻清朝政府，不是一般反对满族人民群众，也不要“奴视满人”，“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⁶可见“排满”主要是为了争取民族平等，更主要的为了反对专制制度，是为了争取民主共和。

在辛亥革命的时论中，中国民族独立占有主要的地位。章太炎以相当多的篇幅，多次介绍讨论印度的亡国及独立革命，表示其对西方国家侵略印度的愤慨之情。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的早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其论说则充满着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意识，强烈要求民族独立。辛亥革命期间关于民族问题的上述论述，其深度和广度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所未有过的。

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民生”是一个重要问题。孟子设计的“仁政必自经界始”，即视土地制度为政治核心问题之一。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问题已成为先驱者所考虑的首选问题之一。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

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

又称：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庶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⁷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必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贫富悬殊、劳资矛盾十分尖锐的状况，提出应防止中国社会在政治革命之后出现类似的“弊病”。他的民生主义主要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内容，他希望依靠土地和大资本的国有化，以求最大限度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而避免贫富悬殊，使社会财富为大多数人民大众所享有。

辛亥时期的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冲破了传统政治理论的格局，促进了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 20 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这里不难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文思潮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的区别。“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我国西周时期的典籍《周易·贲卦·彖辞》，相当于《尚书》中“文明”一词的含义，并不具有从历史哲学出发的“人文主义”的内容。今天我们使用的“人文主义”概念出现较晚，可能是 1808 年德国教育家 F·J·尼特哈麦最初用德文 Humanismus 来表述，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 1859 年出版的著作中首先用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内容概括，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⁸1986 年，瑞士布克哈特出版了欧洲文艺复兴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⁹对 13 至 16 世纪意大利三百年文化进程作了深入研究，指出“人文主义”乃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最好概括：首先，这将个人理性的独立自由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呼吁人们从中世纪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其次，个人理性的独立自由，需要有一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种精神营养，这就是古希腊的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观，因此，欧洲文艺复兴可称之为“回到古希腊的文明”，表面是复古和回归，实质是革新和创造；最后，欧洲文艺复兴精神在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得到充分的反映，群星灿烂，这里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可以归结为个人、或巨人对于“完美”的追求；而“完美”也许并不在“上帝”自身，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巨人”思想里。因此，这种追求个人理性价值的人文主义成为欧洲近代文明的发端。

由此我们反观辛亥革命时期人文精神，不难看出，由于中西历史的具体道路不同，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存在差异，在 13 至 16 世纪曾经以自身的人文主义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西方国家有些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东方国家的压迫者。这个时期，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其先驱者在准备进行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既从西方 18 世纪思想宝库里借来天赋人权论，又从 19 世纪借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更从文艺复兴时代借来人文思潮（“追求完美”），然而所有这些都和当时的中国现实发生了冲撞，于是对西方学说的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便成为辛亥时期人文精神的一大特点。20 世纪初，中国人文精神的灵魂不是西方个人理性的高扬，而是对于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热烈追求，这里便显示出近代东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这恰恰是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基点。

科学观念的人文思考

中国的传统科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汉，形成了以“太初历”为雏形的天文历法体系，以《九章算术》为范本的数学体系，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为标志的医药学体系，后世以注经方式加以发展，到宋元时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在接触西方科学技术之前，中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固有科学体系的不足。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通过与徐光启（1562—1633）等开明知识分子结合，将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斯多德宇宙论传播到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此极为关注，并初步意识到西方科学的长处。

但真正对西方科学产生切肤之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人们发现西方科技已经发展到远远超出中国所能想象的程度，“师夷长技”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19 世纪 70 年代所兴起的洋务运动，表现出对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中央和地方设有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少地方办起了“船政局”、“制造局”，这些机构不仅造船造炮，也翻译出版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书籍。其中仅江南制造局就共计译印图书 178 种，包括史志类、政治类、交涉类、兵志类、兵学类、船类、学务类、工程类、农学类、矿学类、工艺类、商学类、格致类、算学类、电学类、化学类、声学类、光学类，天学类、地学类、医学类、徒学类、地理类等 24 项。¹⁰其所译之书，如侯失勒（Herschel）之《谈天》，雷侠凡（Lyell）之《地质浅说》，代那（Dana）之《金石识别》，田大日（Tyndall）之《声学》、《光学》，都是一时的名著。但是这些科学知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甲午一役，失地丧师，运用西方科技的北洋水师不堪一击。人们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科技，不能解决问题。学习西方科学不但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科学理论

辛亥革命与20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及科学精神。

辛亥革命时期，如何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1901年到1911年间创办的《教育世界》、¹¹《新民丛报》、¹²《新世界学报》、¹³《广益丛报》、¹⁴《东方杂志》¹⁵等文理综合性期刊，以及《亚泉杂志》、¹⁶《普通学报》、¹⁷《科学世界》、¹⁸《中外算报》、¹⁹《商工旬报》、²⁰《实业报》、²¹《农工杂志》²²等科学专门杂志，对于科学的译介和传播十分重视。例如《新民丛报》主要栏目“图画”刊登了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图像、遗像，以直观的方式介绍西方科学家发明家。该刊还发表了一些科学家传记。当时的科学杂志密切关注西方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亚泉杂志》第一次系统介绍并刊登了1869年俄罗斯化学家门德耶利夫（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性质随原子量的增加而周期性变化的“化学周期律”，并最早报道了镭和钋两种放射性元素的发现，介绍了原子、分子论等新的化学理论。民国时期的许多科学家就是从这些宣传介绍中受到启发，从而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当时的科学杂志提出应该把科学置于与政治民主和道德进步同等重要的地位，《亚泉杂志》作为中国人独立创办的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突出地表明了办刊者的科学态度、科学立场和办刊目的。《亚泉杂志序》云：

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

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

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比藉艺术以成之。……²³

办刊者认为政治与艺术（工艺技术、科学技术）的关系是：科学技术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凭藉。该刊预言 20 世纪是科学技术的时代，认为欲图祖国富强，就必须发展科学技术。

为了发展中国的科学，这一时期的报刊呼吁近代科学的实验精神。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就赞美西方科技，“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²⁴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更加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科学的实验精神，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科学。刘师培 1906 年在《北洋学报》第 37 期发表《古学由于实验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各种学问皆源于实验。如历数学始自伏羲建历度，黄帝使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地学始自苍颉言地日行一度，至于大禹，遂以高股之形定山川之高下，复顺山脉河流，以导山导水，医学始自神农尝百草，兵学始自风后著《握奇经》，农学始自神农教民播谷……可见：

上古之时，用即所学，学即所用，舍实验而外，固无所谓致知之学也……则古人之学无一非基于实验。²⁵

中国科学后来落后于西方，关键在于没有继承和发展科学实验精神。

这一时期关于科学的讨论已经接触到如何学习西方科学理论的问题。中国传统科学有很强的实用性，许多科技著作，都以解决实际问题著称，与西方科学相比较，相对缺乏对于科学理论的探讨。辛亥时期，对于传统学术（包括传统科学）的这